

臺灣漁業人物口述訪談 余正雄先生口述 訪談錄

時間：2011 年 9 月 ~ 2012 年 5 月

地點：臺北市中山北路

訪談整稿：國史館協修薛月順

一、家世

曾祖父渡海來臺

我於 1931 年在廣東汕頭出生。我的曾祖父余春錦先生原籍廣東梅縣，是客家人。他是清朝咸豐 8 年的舉人，而且還是個狀元，被派到臺灣來工作，本來在屏東，後來才到中壢。當時在中壢有兩位舉人，一位是我曾祖父，另一位是吳伯雄的曾祖父吳聖昌先生。我的祖父余紹賡先生出生於中壢，他是光緒 8 年的舉人，做過淡水縣參事、候補知縣與新竹州參議；除此之外，他還歷任中壢盛業金融公司理事長與中壢輕便公司、桃園產業會社、桃園茶業公司的董事。

我的雙親

我的父親余阿岑先生畢業於日治時期的「臺北工業高等學校」（即今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」的前身「臺北工專」），畢業後任職於礦業公司，因為職務的關係，調查了全臺灣的煤礦和金礦後，發現其開採的經濟價值不高，因為臺灣的礦脈並不連貫，可能是由於地震頻繁的關係，礦脈到某一處就斷了，不知道該往何方向繼續挖才挖得到礦，開採的成本很高。我父親因此認為這項行業在臺灣沒有前途，於是到中國大陸考察，希望找新的出路。此時父親的元配夫人逝世，於是他帶著與元配所生的子女，來到了廣東潮洲、汕頭。之所以會在潮、汕定居的原因，是因為他覺得那裏的風景很像桃園，於

是就此住了下來。

我父親當年取得日本三菱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總代理權，事業經營得有聲有色。當時汕頭還沒有商用客機，要蓋飛機場時，機場的計劃用地中有一塊是我父親的私有地，他很慷慨地捐地給政府。

我母親林美祥女士是汕頭人，我父親到中國大陸經商後才娶了我的母親。我的外祖母是醫生，母親也是一位醫生，1907年出生，18歲（1925年）就被送到上海東南醫科大學就讀，後來又到日本留學。當年在汕頭會講日文的不多，而我父親是日本商社的代理商，在臺灣日本殖民政府受過教育，精通日語，1929年父母親因此有緣而結婚。

舉家返臺

我的父母於1949年回到臺灣，當時很多人以為來臺灣2、3年後就會回去，所以在中國大陸的不動產都沒有處理，但我母親之後幾次返回汕頭，處理財產，賣掉不動產後，買了美金和黃金，帶回臺灣來做生意。

父親剛回臺灣時，借住在一位姓王的朋友家，他是新竹貨運公司中壢站的主任，和我父親交情很深。我父親在大陸經商時，賺了很多錢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匯了20萬元給王先生，委託他在臺灣購買土地，當時的大學畢業生一個月薪水才幾百元，20萬是很大一筆錢。王先生為人太好了，太為我父親著想，他看到戰爭期間，田產房子根本沒人要，大家都要賣房子，誰還要買？於是

就把錢存在銀行，一塊地也沒買。而我祖父信仰佛教，把錢都捐給廟宇，沒留什麼財產給我父親，除了一塊位於中壢和內壢間的道路旁的田地，我記得那條路很荒涼，每回走那條路時都很害怕。那塊荒地於1949年被裝甲兵借用，阿兵哥和軍眷在那裏蓋房子之後，根本要不回來。所以我父親返臺時，連住的地方都沒有。

我父親是很優秀的事業家，他看大陸的情勢不佳，打算在臺灣生根。可嘆時運不濟，他遇到兩件不如意的事情，讓人不得不相信命運，命運不好，再努力都沒什麼用。

首先，他做了一件別人想都想不到的事。日治時期，臺灣就有彈珠汽水的生產，需要用特製的玻璃瓶，不能用普通的玻璃瓶，因為裏面有氣體，普通的玻璃瓶容易爆裂。製造彈珠汽水的玻璃瓶工廠在戰爭時被轟炸、毀了，戰爭結束後，日本人又離開臺灣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恢復生產。於是我父親開始在市場上收購彈珠汽水的空瓶子，並且在臺北往基隆的山裏租了一間倉庫儲存。之後玻璃瓶果然如預期般價格大漲，可是家父並沒有因此賺到錢，因為那間倉庫的屋主財務發生困難，竟然在我父親不知情的情形下，變賣倉庫裏的玻璃瓶後，不見蹤影。這是家父回臺灣後受到的第一次打擊。

第二次的打擊更嚴重。玻璃瓶被盜賣，錢也賠光了，我母親又回到汕頭變賣財產，換成黃金帶回臺灣。這時父親受過教訓，再加上他認為臺灣一定要走生產的路線，而水

泥是當時最好賺的生產事業，因此他決定從事水泥業。水泥的生產重鎮在南部的高雄，但銷售市場多在北部，從高雄運一袋水泥到臺北要花 10 元，他認為如果可以直接在北部生產水泥，就可以節省許多運輸的成本。他調查之後，發現蘇澳有水泥礦，和幾個朋友一起把礦山買下來。

買了礦山之後，就要建廠，接著還要買機器才能生產水泥，而機器得要從國外進口。從日本進口，距離最近、花費最少。向國外買東西就要向政府申請外匯，當年「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」副主任委員尹仲容雖獎勵生產事業，但為了防止商人拿到外匯後不進口物資，反而把外匯賣掉，從中賺取差價，因此規定申請外匯時，要有 100% 的現金存在臺灣銀行，等批准之後，政府直接開 L/C（信用狀）給對方，進口所購商品。

因此我父親把手邊的美金和黃金換成臺幣，再加上從親戚朋友處籌得的資金，全都存到臺灣銀行，以便申請外匯。申請過程需要一段不短的行政作業時間，就在申請書送出去後，審查也通過了，但尚未得到正式批文之際，政府為了穩定經濟，實施新臺幣改革，舊臺幣 4 萬塊只能兌換 1 塊新臺幣。新聞發布的隔天，我父親一早起床，打開報紙，一看到這個消息，心想完蛋了！存在銀行裏的舊臺幣一瞬間就貶得一文不值了，急得當場中風。後來將礦山賣給信大水泥公司楊塘海。

父親中風後，家裏找了個養女來照顧他，她在我家最苦的時候幫助我們，她自己並不覺得苦。她後來嫁人，生了三、四個小孩，自己做一點小生意，我母親過世時，我想辦法找到她，給了她一些錢，我只是為了表示一點心意，但被她婉拒。

母親獨撐家計

我母親是臺灣第一位正式取得執照的整型外科醫生，1950 年代的「小針美容」就是她開創的。她原本是婦產科醫生，父親中風後，全家生活的重擔落到我母親身上。我母親思考，從事婦產科很辛苦，產婦半夜來敲門，不能拒絕。於是她想到日本進修再轉行，當時日本醫界最熱門的是整型美容。然而出國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需要日本的公司給聘書，才可能放行。還好有朋友幫忙，讓我母親掛名日本商社的經理，聘請她去日本考察。她的運氣也很好，她的朋友介紹東京帝大的一位整型科醫師，讓她去學習整型技術。她本來就有醫學的相關背景，學了一年之後，具備各項知識，又掛念家裏，急著想回臺灣，但是有一項關鍵藥品，是日本醫師的獨門配方，外面買不到，沒有那種藥，很難做得起來。

那位醫師在家母臨行前，要她在東京最出名的中國飯館擺一桌，請大家吃飯。我母親嚇得半死，當時也有幾位外國學生在他那裏學習，但都沒有這種先例。席間，他說：「那個藥啊！我已經叫護士長準備好，讓妳

帶回去。」家母總算一顆石頭落了地，安心了，要不然，學了半天，沒有這項關鍵藥品，根本沒有用。

家母回臺灣開業後，很快就造成轟動。我們找了幾位明星和新聞記者，當場示範，手術之後，效果果然很好，那幾位明星變得更漂亮了。之後記者帶妻子來，我母親都替他們免費服務，那也是我的主意。那些記者事後在報上寫了幾篇報導，宣傳家母的整型手術。從此家母的診所門庭若市，生意做不完，從上午做到下午，中午休息時，我都要替她做按摩，還要請銀行每天下午三點半，特別派兩個人帶著布袋，來診所收錢存銀行。

我的母親很偉大，眼光看得很遠。1971年臺灣退出聯合國時，很多人賣房子賣股票，準備跑到外國去。我母親說，幾十年來，以在臺灣的日子過得最好，所以她不離開臺灣。既然不離開，就開始收購別人拋售的房地產和股票。當時有個高雄人想出脫第一銀銀行的股票，價格很便宜，但條件是得將他手中的持股一次全部買下。我母親當時經營的整型外科診所賺了很多錢，我的事業也做得有些起色，於是將對方的股票全買了，我因此當上第一銀銀行的董事。

二、求學

至日本讀小學

我雖然出生於中國大陸，但由於父親是

日本三菱公司中國地區的總代理，希望日後我能繼承他的事業，因此將我送到日本的寄宿學校讀小學。那時候在東京，正逢戰爭期間，有美國飛機來轟炸，學校時常不上課，我父親擔心戰爭期間遇到突發狀況，不能匯款，使我在日本生活出問題，因此在銀行存了一大筆錢，規定我一個月只能用900元，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，可以買黑市的東西。當年會有鄉下的歐巴桑，把雞、豬肉等料理好送到家來賣給我，生活上不成問題，但我孤零零的一個人，心裏很苦悶，也很想家，每天晚上看到天上一輪明月，就開始掉眼淚。

戰爭結束後，所有船隻都用來載運滯留海外的日本軍民返日，我過了1、2年才搭上從日本到基隆的船班，再從基隆到汕頭，回到父母身邊。好不容易回到汕頭，又聽說共產黨要來了，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，究竟該到新加坡或泰國？有人說泰國好，因為泰國的華僑講汕頭話，比較方便，我父親認為我們對泰國和新加坡都不熟，還是回臺灣好了，就這樣回來了。

返臺求學

我在日本讀小學，所以我的日語比北京話還流利。回臺灣時，我已經18歲了，從頭開始學習ㄅㄆㄇㄌ，四聲也分不太清楚，簡直苦死了。我當時心想，完了，我可能無法適應新的社會。我家附近有一家腳踏車店，每當我送腳踏車去修理時，蹲在地上看

著師傅修理腳踏車，心裏就會想著，我如果也能開一家腳踏車店，就心滿意足了。我很努力，臺灣當時如果有新的補習班，柔道、英文等，我都去學，但其中最困難的還是中文。中文、日文和英文這三種語言，我講得最流利的還是日文。

與趙麗蓮的緣份

趙麗蓮剛到臺灣來的時候，在電臺教英文，而且頗受歡迎。（註1）有一次我路過中山堂附近的「婦聯會」時，看到一張趙麗蓮教授英文的宣傳海報，我當時馬上報名。趙麗蓮每天早上6點在新公園附近的中國廣播電臺教英文，上 English Digest 的課，我清晨五點半就到廣播電臺，即使冬天很冷，也從不間斷學習英文。

上課時，我每次都是坐在第一排。當時她一個人住臺大的宿舍，我會去幫她買買東西啦，協助其他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，她要我叫她 Aunti。我怕她晚上不安全，特地買了一隻小狗送給她，陪她作伴，後來她和那隻小狗的感情很好。

就讀成功中學

戰爭期間在日本，我根本就沒怎麼唸書，回臺灣以後，又耽擱了一段時間，後來進入建中夜補校，再轉學到成功中學。

之所以轉到成功中學是因為一次意外。我讀建中夜補校時，騎腳踏車上學，那時候流行把坐墊抬高，有一天晚上上學途中，軍

方正在南海路拉電線，晚上視線不佳，坐墊又高，一不小心頸子就被電線勾住，整個人往後仰，頭部著地，結果腦震盪，3天後才醒來。那時候我家住在臺大法商學院附近的銅山街，離濟南路的成功中學很近，因此轉學到成功中學，從一年級開始唸起。那是1950年的事情了，時局很不安定，根本沒辦法好好唸書。臺北的學校有所謂的「十三太保」，強恕中學也有很多流氓，大都是上海人，當然，我還沒資格加入，但是很羨慕。當時臺灣夏天大多數人都是穿前面3個釦子的汗衫，他們不一樣，穿的是在臺灣本地買不到的三槍牌圓領的汗衫。當時政治不安定、社會不安定，學生也不安定，學校裏每天都會聽說誰在那裡打架，教師的流動率也很高。所以我中學時也沒能好好唸書。

在成功中學讀書期間，對我日後影響比較大的，可能是認識了蔣孝文。蔣孝文的母親蔣方良女士是蘇聯人，混血兒的長相比較奇特，我原本不認識他，有一天在校園裏遇見了，脫口而出：「奇怪了，我們學校怎麼會有雜種」。蔣孝文一聽之下，被激怒了，和我動手打起架來了。不打不相識，從此我們兩人成為好朋友。

1952年，我於中學畢業後，考取了兩所學校，淡江（「淡江英語專科學校」，即今之「私立淡江大學」）和海洋學院（「臺灣省立海洋學院」，即今之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」），我以為讀海洋學院可以坐船到全世界，還可以賺美金，所以就放棄淡江，去

唸基隆的海洋學院航海系。

赴美進修

我大學畢業後經營漁業公司，後來才把漁船租給政府送遊擊隊員到大陸做秘密工作，再於 1963 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唸書，我靠那筆租金在美國生活過得比一般留學生還好，而且當我告訴情報局局長葉翔之我要到美國去唸書時，他還資助我一筆錢。之所以會再繼續進修，起因於我的 Aunti 趙麗蓮，她告訴我如果不繼續從事漁業，最好再到美國唸書。因為有這段留學的經驗，所以當我結束三友和經緯兩家漁業公司後，才能轉戰金融界。

我在哈佛大學讀商學院的國際市場管理，為期一年的“special course”，1964 年底就回來了。我為了節省時間，寧願多花一些錢，吃、住都在學校內，我通常一天中只吃早餐和晚餐兩頓。我去美國讀書時，已經有一些經濟基礎，但當年的留學生都很苦，臺幣 40 元才換美金 1 元，沒有錢就沒辦法四處走動，所以如果說去唸個幾年書就能多瞭解美國，是騙人的，包括我在內。我對美國的瞭解是後來做事業賺錢之後，有機會再到美國，才能進一步瞭解這個國家。

因為有這段留學的經歷，我還當過臺灣的哈佛大學校友會會長，因此有緣結識了當時擔任陸委會主委的馬英九。

三、從事遠洋漁業

當兵發大財

我於 1956 年自海洋學院畢業後，在海軍服預備軍官役，又是人生的另一個轉捩點。我們海洋學院畢業的學生服兵役時，一定會被分發到海軍，沒有第二條路。那時觀察到左營海軍的小港口裏，停了幾艘廢棄的砲艇，砲被鋸掉了，用鐵鍊將船綁在一起。夏天的傍晚，我有一天閒來無事，拿了塊石頭敲一敲砲艇，鋼板還挺厚的，奇怪了，怎麼不要了呢？我就問長官，長官說那是準備要標售的船。我覺得砲艇被賣掉當廢鐵回收，可惜了，而且賣得的錢不屬於海軍，需上繳國庫。我是科班出身的，心想如果把砲艇改裝成漁船，讓漁民出海捕魚，出售魚獲所得的錢，可以變成海軍官兵福利，不是很好嗎？我把這個想法告訴長官，他回答說這事需要海軍總司令批准才行。層級太高了，太麻煩，這件事就此作罷。

有一次休假回臺北，和蔣孝文聚會，我把這段經歷告訴他，他聽了我的想法後，也覺得很好，就說要介紹海軍總部的人。我一聽嚇了一跳，趕忙說我只是胡思亂想而已，他表示沒關係，要我去找政治部主任江國棟。我只是個少尉，第一次進海軍總部，怕得有點發抖，江國棟當時的官階是中將，但卻很客氣，問我有什麼指教。我很不好意思，把我的想法告訴他，他聽完了以後說：「對啊！我們從未有人想過這種事，你擬一

個計畫書給我，寫好了以後，找我的秘書約時間再進一步來談。」我一輩子沒寫過計畫書。沒辦法，只好將我的構想，簡單地寫了一頁，交給他。

江國棟看了之後，要帶我去見海軍總司令黎玉璽，我嚇壞了，但還是硬著頭皮去了。黎玉璽看了我的計畫書後，說：「很好！這樣子好了，先撥兩艘廢砲艇給你，你去做做看。」我從沒想過要自己做，我嚇得連話都講不出來。這下子怎麼辦？

我週末休假沒回臺北時，住在西子灣高雄漁業理事公會附近，我問住處的管理員認不認識公會的理事長，他說：「認識啊！每次選舉時，理事長蔡文玉都會來拜託。」蔡文玉同時也是省議員，那位管理員於是帶我去找蔡文玉。蔡文玉很贊成我的想法，建議兩人合作。我說我不懂，而且也沒有錢修船，蔡理事長說沒問題，他負責出錢修船，我只要把砲艇拖過來就行了。改裝後的漁船出海捕魚所得，一半給海軍，另一半由我和蔡文玉兩人均分。當時公務員一個月薪水才一千多元，我一個月就可以分得一萬元，所以我還沒退伍就有一大筆資金。

經營漁業公司

退伍後，我拿這筆錢加上貸款，建造新船。當時政府獎勵生產事業，鼓勵發展遠洋漁業，提供很好的條件，讓我們貸款取得資金去買船，利息很低，10%左右，而且可以貸到七、八成，農復會漁業組的陳同白和關

壯狄對我們的幫助最大。於1960年代，我的船噸位不小，250噸雙拖日式的漁船，跑遠洋，每次都滿載而歸。

我有兩家漁業公司：經緯和三友漁業公司，經緯的規模大約4、5艘、三友有5、6艘漁船。因為我的信用很好，又在日本受過教育，而且我父親曾是三菱公司中國區的總代理，長期與日本合作，我在日本訂製船隻，三菱公司替我做保，所以我不需要先付款。

臺灣的漁業公司，比較有規模的是高雄的豐國漁業公司，其靈魂人物是郭欽敬和周俊雄。郭欽敬是日本水產大學畢業，是真正的專家。豐國在全世界都有基地，許多韓國、日本、臺灣，或其他國家的漁船進入豐國的基地加油、補給食料，再把漁獲賣給他。這些漁船在出海作業前，豐國先給予融資，一艘船大約3至5萬美金，分期還款，但是漁獲必需賣給他。他們在模里西斯設有基地和辦事處，我的漁船抓了魚，進入模里西斯後，賣給豐國，豐國再賣給美、日等國的大商社。這家公司本來也有遠洋漁船船隊，但是現在已經轉型為貿易商。

現在做魚罐頭的工廠，主要分布在日本、美國的洛杉磯、薩摩亞和模里西斯，日本的商社收購進來的魚，也大部分進入這些工廠。

秘送游擊隊員出國

1953年韓戰結束後，美國雖然有第七

艦隊防衛臺灣，但不支持反攻大陸，因此政府常偷偷訓練游擊隊到大陸做秘密工作，但人員訓練完成後，該如何送到大陸去，卻成為問題。因為不能讓美國知道，而當時陸、海、空軍都有美軍顧問團的人員，軍隊的一舉一動，美國都很清楚，所以不能以政府的軍隊載運，需要秘密進行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民間的漁船，好處是第一不顯目，第二，萬一不幸事跡敗露，政府部門可以否認到底，這是蔣經國的左右手江國棟想出來的點子。我記得有一次蔣孝文、江國棟、情報局局長葉翔之、（註2）和亞洲水泥董事長王新衡，（註3）來找我一起去圓山飯店吃飯，江國棟於席間對我說：「政府想借用你的漁船，送人到大陸去」。替國家做事的機會比發財還難得，我當時聽了覺得這是為國服務的機會，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，雖然我母親認為太危險了而反對，我還是把漁船租給政府。



1962年前後攝於訓練游擊隊員之秘密基地（前排右3余正雄、右4江國棟）（照片提供／余正雄）

漁船上面通常還載著橡皮小艇，靠近目標之後，把小艇放下來，才能把人送到對岸去，來回大約要一個星期，我記得送了好幾次，直到有一次在海南島的行動，漁船被包抄為止。大約於1963至1964年間，越戰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，中共每天廣播罵美國，明言美國如果破壞中國與越南之間的國界橋，就是對他們宣戰，美國不想挑起事端，因此不敢動那座橋。而我們的游擊隊卻故意去炸它，破壞橋樑之後，游擊隊員急著返回，抄捷徑，沒有繞道菲律賓，直接經過中國沿海，結果在海南島的宜寧港，被十幾艘中共的海軍快艇包抄，4艘漁船全部都回不來了。

遇到這種情況，不能公開說漁船去打游擊戰而損失，於是就向政府報失蹤，警備總部出具失蹤證明後，由保險公司理賠60%。雖然如此，根本抵不過我的損失。不過我們那個時代講究道義，而且我做這件事是心甘情願的，不會計較這些。

現在的年輕人已經沒有為國犧牲的觀念，那些游擊隊員都是志願的，有犧牲奉獻的精神，真是了不起，90%以上的人都回不來，他們可能有回大陸家鄉看親人的誘因，一般臺灣人怎麼肯做這種事？我送出去的游擊隊員沒有人再回來找過我，到底是陣亡了、或是在大陸落地生根了、或已返鄉了？我不知道。

意外促成沙國借款

1970年代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計劃發展紅海地區的漁業，紅海是他們的內海，外國漁船沒有經過准許進不去。但是他們的漁業落後，沒有現代化的漁船，還是用很古老的帆船抓魚，一艘船只有5、6個人出海作業，漁獲量不高。所以沙國政府和臺灣方面接觸，希望能與臺灣的漁業公司進行合作。孫運璿院長於是找我，並且暗示我，因為他們有石油資源，於公於私，這都是個很好的機會，不管他們開出什麼條件，都要接受。因此我和闕壯狄一起出國，去和沙國親王見面，當時我提到建造多少噸的漁船需要多少錢，他們嚇壞了，沒想到金額那麼高。後來是我讓步，漁船使用我的，但是漁獲雙方對半分，沙國親王聽了很高興地接受了。

那是1973年的事，但我和沙國的漁業合作維持不久，大概只有2、3年，因為石油的關係，他們很快變得富有。之前是因為窮困，不得已才去抓魚，後來石化工業迅速發達起來，政府有錢了，就幫助漁民在陸地上生活，不捕魚了，所以他們連船都沒有建造。事實上，雖然我們在高雄有個訓練所，專門訓練外國的漁工，但臺灣和其他國家的漁業合作，很少成功的，原因何在？一是漁船的造價高，二是當地的漁民不像臺灣漁民肯吃苦，當他們訓練完成後，吃不了苦，寧可把錢拿去做別的事，也不願造船，所以根本發展不起來。全世界的遠洋漁業主要還是靠日本、臺灣和韓國，連中國大陸、菲律

賓、泰國和印尼都無法相比。

但因為我與沙國的這段關係，意外造就臺灣向沙國借款的機緣。大約在1974年1月，有一次和我合作從事漁業的Mitab親王帶我進皇宮，巧遇沙國的財政部長塗爾吉（H.E. Sheikh Mohanmmmed Aba Al-khai），因此Mitab親王介紹我們認識。那天部長就告訴我，說他下個月將接受李國鼎的邀請，到臺灣訪問。

我後來才知道臺灣1970年代從事十大建設，蓋了中鋼、桃園機場之後，接著計劃建造貫通南北的高速公路，但是經費不夠用，向外國借款的利息很高，而且為期只有8年，還不一定借得到。因此1973年3月財政部長李國鼎即與沙國洽談雙方經濟合作，次年塗爾吉即受邀來臺。

因為當年財政部和外交部沒有人見過塗爾吉，只有我見過他，而且沙國人都是包著頭巾，一大群人一起走下飛機，不太容易辨識誰才是部長，所以財政部特地邀請我陪同接機，避免發生認錯人的尷尬場面。

接機後的第二天，財政部錢幣司司長趙既昌來找我，希望沙國貴賓在臺的行程，我能陪同接待。就這樣，我陪伴沙國貴賓8天。接機後的第二天，財政部次長王紹堉問我，能不能向沙國詢問借款建造高速公路的可能性。我開始傷腦筋，並思考怎麼向他們開口借錢。後來我自己掏腰包，特地將整棟「五月花大酒家」都包下來，招待沙國親王與隨行眾人，「五月花」的老闆勸我只要包

下一層樓就夠了，不需要花那麼多錢，但我為慎重起見，還是整個全部包了。他們阿拉伯回教國家主張禁慾，很少見到這種陣仗，每個人都玩得很開心，我乘著他們心情舒適放鬆時，探詢借錢建設高速公路的可能性，此時塗爾吉部長很爽快地答應說：「請你們李部長寫一封信經由沙國大使館轉交給我，我再親自交給我們費瑟國王（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）。」

他們回國後不久，塗爾吉部長通知我，沙國國王已經批准貸款 5,000 萬美金給臺灣，並要我去找他。財政部知道消息後，叮囑我需在兩個條件下，才可以接受貸款，一是還款的期限要長，至少 8 年以上；第二，利息要低，6% 以下。沒想到我到了沙國，見到塗爾吉部長，他告訴我：「我們國王說臺灣的中國人是可以信賴的，我們要和你們做朋友，所以借款期限 30 年，利息全免。」我回臺後轉述這些話，財政部的官員不可置信，以為我聽錯了。

這就是高速公路上之所以有「中沙大橋」的由來。所以我常覺得我是「好傻一生一世」，我做的很多事都是如此，我自己出錢出力替國家政府做事，沒有第二句話，卻又做得很高興，還感覺很光榮，因為上帝賜給我能力，可以服務國家，是件好事。

交涉漁業糾紛

鮪魚公會初創時（「臺灣區鮪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」，成立於 1970 年 6 月 15

日），理事長是漁業局局長退休的劉永懋，我擔任常務理事，公會剛成立，組織規模很小，但是問題很多。臺灣附近的海域魚源枯竭，我們的漁船要進入別的地國的領海，才能捕到魚，我們主張領海是 12 海哩，愈是落後國家愈是主張 200 海哩，因此我們的漁船時常被人家的海軍抓走，被抓了之後，印尼等國大多需要用錢解決，比較上軌道的國家則是直接送法院審理。

當時公會裏會講英語的人不多，所以時常找我和闕壯狄出國。闕壯狄因為官方公務員的身分，比較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正面與對方接觸者，大部分是我。與外國人交涉，除了花錢之外，還得花心思和他們周旋，才能討價還價。

（一）與澳洲交涉

高雄有一艘漁船在澳洲海域被他們的海軍抓走了，被拖進最北面的一個小港口裏。經過法院審理，律師表示，情況對我方很不樂觀。漁船的船東來找我商量，怎麼辦？船如果被沒收，人會被監禁，公司也會倒閉的。我和船員們商議，決定走一條險道，如果法院判決沒收漁獲與船隻，當天馬上逃回臺灣。如何逃法？澳洲人口很少，阿兵哥更少，整個港口只有一個衛兵巡邏。港口的出口處有一道橋，漁船桅杆的高度比橋還高，他們認為這是個障礙，漁船逃不了。我建議船員拿根釣桿，爬到橋上釣魚，目的是測量從橋面到海平面的距離，然後鋸一鋸超出橋

高度的部分桅杆，不能真的鋸斷，鋸到將斷不斷的程度就停止，等下午漲潮時，讓船隨水漂流到橋邊，再啟動引擎，事先鋸過的桅杆一碰到橋，馬上就會斷裂，然後就可以順利通過那道橋，這時候加足馬力，全速朝大海揚長而去。澳洲海軍只有兩艘小艇守在碼頭，等他們發現時，漁船早已過了12海里，到了公海，他們是講法治的國家，不敢來抓。

判決結果，果然是沒收船隻，我們的漁船也照著我說的方法，順利逃走。澳洲軍方根本沒想到我們會逃走，反應不及，連追都沒來追。因為那是個小城鎮，人口沒幾萬人，機場沒有國際線班機，得要先飛雪梨，才能回臺灣。我怕被扣留，判決前幾天，先離開澳洲。這是2、30年前的事了，我因此到現在還不敢去澳洲。

（二）與印度交涉

有一艘高雄籍漁船被印度海軍扣住了，我得去交涉。我要去印度交涉前，缺乏相關訊息，闕壯狄和我商量，先去找外交部司長李鍾桂。她告訴我一項資訊，印度航空公司飛香港、日本的班機，都是經過臺灣的領空，我們都沒有阻擋；她還讓我去找「世界亞洲人民反共聯盟會」裏的印度代表，我發現找反共聯盟會的人影響力很小。後來我去衡陽路的書局找到一本薄薄的、介紹印度的書籍，書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蔣介石夫婦訪問印度，當時印度還是英屬殖民

地，蔣介石向英國要求拜訪「印度聖雄」甘地，但被拒絕，蔣介石表明百分之百支持印度獨立，此行若未見到甘地，不會回國，當年國際間都懼怕英國之強勢，很少人敢公開說這種話。

到了法庭，我先試試風向，所以先說明這些船員都只有小學畢業，他們在海上作業，沒有注意是不是越界了，不是有意侵犯人家的領海；接下來，我再提出二次大戰時，蔣介石和印度之間的這段歷史，拉近兩國的關係；最後再提印度航空飛過臺灣領空的事。然後我對著庭上說：「如果不幸我們的船員被判有罪，我要回去告訴臺灣當局，你們這是無禮的判決，我們一直對貴國很禮遇，無條件讓你們飛過領空，今天我們的船員只是犯了一點小錯，你們就要沒收，我要呼籲政府不讓你們的飛機經過。請不要影響我們兩國的友好關係。」後來法院判決結果漁獲沒收，漁船與船員釋放。這一次的交涉算是成功的。這些都是很久以前、在我結婚（1974年）之前的事了。

（三）漁民借助日本商社的力量

菲律賓和我們相鄰，也時常有漁船的糾紛，但因為臺灣和他們的關係比較好，可以透過外交管道解決。馬來西亞和泰國近海比較少漁場，自然較少漁權的問題。印尼就不一樣了，印尼是個島國，附近有許多大漁場，他們的海軍常在海上巡邏，看到臺灣的漁船就扣留，得要用錢才能解決，而且

還要搶在海軍移交法院之前，因為印尼官方規定海軍抓到漁船後，在一定時間內就要移交法院，所以必需趕時間，要愈快愈好，否則被送到法院後就比較難解決。我只去過印尼 1、2 次，陪著船東交涉賠錢。當年外匯不自由，臺灣方面的銀行不可能馬上匯款到印尼去賠人家的錢，怎麼辦？就只能靠日本的三菱和三井等商社幫忙融資，錢趕快給人家，漁船才能被釋放，日後船隻的漁獲就得賣給日本。日本大商社的這種實力，就不是臺灣任何一家漁業公司可以比得上的。

結束漁業公司

我那 4 艘秘送游擊隊員出國的漁船，雖不小心被炸沉了，漁業公司還繼續經營，公司在高雄，由我的弟弟代管，大約是到我 1974 年結婚之後，遇到石油危機，油價大漲，即使漁船滿載而歸，也賺不了什麼錢，因為成本太高，出售漁獲的獲利都抵不過油錢。後來又有一次我的漁船出海作業回程時，在東沙島火燒船，因為電線短路，冒出火花，船艙引擎機房內有石油，一下子就著火了，因此於 1979 年結束漁船公司，將漁船賣掉，把錢投入金融事業。

當時正值臺灣與美國斷交，股票大跌，我看好金融業，所以大買股票，因此做了 10 年的第一銀行董事。2 年後，臺灣的金融股第一次資產重估，一股配 4 股，又加上股票大漲，漲了 5 倍多。

今後臺灣漁業的希望在於養殖漁業，遠洋

漁業很難發展，原因在於成本高，而且魚源愈來愈少，漁工又很難找，漁獲量將會受限，而漁船船員出去一趟，兩年才能回來，船上生活條件又差，時常有打架的事情，管理也很困難。

四、經商生涯

經營免稅商店

多禮公司（DFS，duty free shop）是美國最大的免稅商店，事業遍及夏威夷、洛杉磯、舊金山、韓國、新加坡、日本和香港等地。他們透過徐柏園的兒子徐小波，也就是「理律法律事務所」的負責人，想在臺灣找一位能幹、可靠、肯奮鬥，還要有點資本的人，合作經營免稅商店。可能因為徐小波是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，所以他推薦我。我因為不懂這一行，起初決定放棄，並轉介一位有經營免稅商店經驗的人。過了一個禮拜，DFS 又回頭來找我，因為他們覺得我比較值得信任。我很誠實的告訴他：「第一，我對免稅商店的經營很陌生，第二，資本是我的，公司名義上也是我的，卻由你們經營管理，如果虧本了，怎麼辦？」他們瞭解我的顧慮後，向我保證不會虧本，如果公司不幸垮了，會歸還我的本金。全世界最大的免稅商店敢做這樣的保證，我就沒什麼好擔心的了。於是開始了桃園機場和晶華酒店的免稅商店事業，總共做了 25 年，公司的員工規模，最多時高達 600 人。

與國外合作，雖然資本是我提供的，但對方在貨源和周轉金方面，提供許多援助，該買進何種商品？如何取得高品質的低價商品？他們有許多管道可以解決這些關鍵問題。

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免稅商店的經營者，要經過特許才可以經營，是由交通部民航局公開招標產生的，我從 1986 年開始參與投標，每一標為期 6 年，每年交給民航局的權利金就高達 4 億臺幣。所以採購很要緊，得要有辦法壓低成本，才有利潤。機場的免稅商店每天進出的人很多，銷售的量很大，商品進貨的成本如果需要 10 元，但我的關係好，只要 9 元或 8 元，就可以從中獲利。資本百分之百由我負責，供貨來源就由他們負責，因為人家採購的管道很多，在全世界有十幾個免稅商店，可以拿到便宜的貨。

市區內的晶華飯店免稅商店的經營不太一樣，同樣的商品有兩種定價，如果顧客買了是要帶出國的，不用加稅金，否則還要再加上稅金，價格比較高。顧客付錢之後，我們登記班機、姓名和護照號碼，出國時到機場時再取貨。

臺灣到 1986 年時，經濟已經發展起來了，才有辦法賣高價商品，免稅商店也才可以經營得起來。我曾經遇到過一次罷工事件。大約 1986 年民進黨成立後，社會上有很多抗議事件，罷工事件頻起，有的是經營者經營不善，員工起而罷工。我們機場免稅商店的員工也發起過，他們覺得福利不夠

好，但是機場是國家的門面，所以我在公司坐鎮，我對他們說：「你們如果罷工不來上班，以後就永遠不要再回來，因為我付的薪水比別人多，你們覺得不滿意，想跟著流行，學人家罷工，就走，我該給的資遣費一毛都不會少給。」那件事很快就平息了。

我們公司在機場的生意，向民航局投標，第一次幸運得標了，第二次還是由我得標，但第三次投標時，出了一點差錯，蓋錯印章了，結果被別人標走了，所以只做了 12 年。之後的得標者，不知道為什麼將期限從 6 年一標延長為 12 年一標，12 年太長了，誰有本事等 12 年之後再來參與競標？以後很少有人有機會與他們競爭。至於晶華酒店的免稅商店和精品店，於 2011 年租約期滿後，晶華收回去自己經營，所以現在我已未從事這行。

永信綜合證券公司

1980 年代政府逐漸開放券商的經營，所以臺灣開始出現綜合證券公司，除了原來的買賣證券業務之外，還幫助一般企業公司整理會計財務等，輔導他們上市上櫃。永信綜合證券公司成立於 1988 年 12 月，我是第一屆董事長，當時公司總共三個大股東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永豐餘和美商信孚銀行，為國內第一家具外資色彩的證券公司。

綜合證券公司的業務主要在輔導公司股票上市，幫助他們整理會計財務等報表和債券業務，此外還有研究部，定期研究各公司

的狀況。第一批批准成立的綜合證券公司共有 10 家，永信只是其中之一。因為我們當時都不懂綜合證券的業務，於是組織了一個聯誼會，由我擔任召集人，居間聯絡，安排訪問行程，出國去瞭解日本的情況，再到香港去看他們的交易所。

我在永信做了 4 年董事長，後來美商信孚銀行覺得國內證券市場開放速度比預期緩慢，因此決定不想再繼續經營下去，並釋出股權，最後將所持有的永信證券股權由黨營事業接手，1992 年被大華證券合併。永信和大華證券合併後，還是叫做「大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」，國民黨是大股東，我退出經營層面，只是擔任董事，一直做到 2004 年為止。

1992 年到 2000 年我又當上環宇財務顧問公司的董事長，政黨輪替之後才交給徐立德。環宇公司專門分析財務，價值評估與議價，租稅與查帳，建立適當之資本結構及融資方案，例如臺灣高鐵的案子，環宇公司替他們試算過投標金額，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做好精算工作。

五、回首往事

一生多貴人

我今（2012）年 81 歲了，到了這個年紀，身體健康狀況大不如前，覺得人生的終點好像快要到了。回想我這一生，該做的準備都有做好，唯一的遺憾是，下一代還沒有

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。我是一個沒有顯赫家世的小人物，但我的貴人很多，除了基本的做人之外，還要再加上老天爺所賜的緣份。

（一）蔣孝文

我和蔣孝文有些來往，時常出入他的家庭中，有一次還參加蔣經國生日時的家庭聚會。老總統請人替蔣孝文補習古文觀止，經國夫人都要我作陪，我等於陪太子唸書。我年輕時也是時常動腦筋想賺錢，還好我沒有走邪路。如果不是上帝幫我，我可能會走錯路，最重要是我的家境還過得去，第二就是思想，怕拿人手短，我拿了人家的好處，心裏會不安。

（二）王永樹（註4）

王永樹先生是蔣家一位重要的幹部，來臺後做過憲兵司令，我因為和蔣孝文是成功中學同學的關係，與他相識。他親口告訴我，老總統在大陸被中共逼到南京，中共還沒有渡江，正在進行最後談判時，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，去找王永樹，要他將老總統扣住，交給毛澤東。王永樹沒有答應他，送走陳儀後，也沒有向老總統報告此事。過了幾天，陳儀又來重提此事。王永樹此時立即扣留陳儀，並向蔣經國報告。那時王永樹是南京警備司令，而陳儀曾是王永樹的長官，「二二八事件」之後由臺灣返回大陸。這件事之後陳儀又被送到臺灣來槍斃。

他時常和我聊天，每一次公職人員選

舉，他要坐鎮辦公室時，都會邀我投完票後去辦公室找他，他可能想透過我瞭解社會的情況，我所說的與部屬向他報告的事，應該不會一樣。

（三）Turbay

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時，認識當時哥倫比亞駐聯合國代表 Turbay，返臺後我曾邀請他來臺旅遊，遇到聖誕節時也會互寄卡片。沒想到他後來當上了總統。（註5）經濟部長孫運璿曾到中南美洲訪問，哥倫比亞駐臺灣的大使告訴他，我與哥國總統相識，所以孫運璿才會要我隨行出訪。



隨行出訪中南美洲（左起依序為孫運璿、余正雄、哥倫比亞總統 Turbay）（照片提供／余正雄）

（四）大衛洛克菲勒

大約二十幾年前，我已經開始經營多禮免稅商店的生意，有一次世界免稅商店在香港舉辦餐會，坐在我旁邊的是全球知名的

美國洛克菲勒中心的大老闆大衛洛克菲勒（David Rockefeller），這位老先生很有修養，遞給我一張名片，我一看是個大人物，心想今天最好不要開口講話。他也是哈佛大學畢業的，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他的祖父是石油大王，經營的事業還包括鋼鐵、鐵路與銀行等，事業體大到美國國會不得不訂定反托拉斯法來限制他。

當年日本經濟發展順利，日元最強的時候，對美元匯率曾漲到 80 多，日本人資金泛濫，於是到處投資，到澳洲和巴西買礦山，也到美國買不動產。席間，他提起美國參議院正想修法限制外國人來買不動產，他問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。

幾杯酒下肚後，我的膽量就大起來了，講話比較衝，我回答說：「美國政府和參議院是笨蛋，人家家裏有錢，拿大筆現金來買搬不回去的東西，美國應該歡迎才對，為什麼要限制？」我當時認為美國雖然已經建國 200 年，但真正參與國際社會，也只是二次大戰後才開始，因為國際事務的經驗太少，才会有這種疑慮。老先生聽了我說的話之後，默不作聲。

過了大約七、八年，有一天臺北大通銀行的經理，是個我不認識的外國人，忽然來找我，表示他們大老闆 David Rockefeller 要坐專機從美國到臺灣來看我。我說：「搞錯了吧？我只和他見過一次面而已，沒什麼交情，又沒有生意上的往來，怎麼會找我呢？我們中央銀行總裁也是 YU（俞國華），應

該是找他的吧！」他說：「沒錯，是在臺灣經營免稅商店的余先生」。我心想，好吧，和老先生見個面，也沒什麼關係。雖然想不通道理，我還是到西門町訂製一張 18k 金繡的百壽圖送給他，並向他解釋祝福他健康長壽的含義。他很高興地接受了，並告訴我：「七、八年前在香港的餐會宴席上，你還記不得你講過的話，你說不用害怕外國人來買帶不走的東西。第二天我從香港坐飛機回美國時，在飛機上愈想愈覺得你說得有道理，因此決定出售紐約市的洛克菲勒中心。但是現在，就在一個月前，日本三菱公司要求我們減價 2 億美元買回。」洛克菲勒中心是觀光客必到的景點，也是美國的地標，就好像臺北的 101 大樓。（註 6）

中國有句老話：「遠水救不了近火」，當初日本人有錢，大買不動產，七、八年之後，缺錢了，家裏著火，但遠水救不了近火，不動產要賣了才能換成錢，因此得要反過來求人家，不得不賤價賣了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我告訴他：「你如果暫時擱置，不理他，我相信他還會再度減價，求你買回去。」

我們後來變成好朋友，他每年都會請我們夫妻倆到法國和義大利等歐洲國家的宮殿作客，旁邊站著穿古裝的侍衛伺候，好像電影中的場景一般，這是很難得的機會，去過一次之後，一輩子都忘不了。當然人家不是單獨邀請我，受邀者都是他在全世界的 1、200 位好朋友，每年定期招待聚會。後

來我才瞭解，他希望人家記得他，這是有錢又有智慧的人的作法。

我在生意上曾受到他的照顧。我做生意從不借錢，怎麼辦到的？我經營免稅商店時，一般人向國外進貨，都是先開 L/C（信用狀）給對方，貨物才會進口，銀行帳戶裏要先有錢才可以開 L/C 啊，而我是貨物先運進來，賣了以後再還錢，類似委託行的經營方式，所以我可以不需要向銀行借錢。借錢等於吸毒，借了要還啊！還要付利息啊！經濟景氣好的時候還沒關係，萬一市場反轉時，就完了，所以花在借錢上的精神比經營本業還多，何苦呢？

但是外國的供貨商，面對全世界眾多的免稅商店，都是先收到錢才出貨，不可能只對我特別優待。這些供貨廠商都要靠銀行提供貸款，David Rockefeller 大概請銀行幫了忙，否則人家怎麼肯？萬一我跑了，貨到卻不付款，怎麼辦？此外，信用很重要。從小我父母就再三叮嚀我信用的重要性，所以信用這兩個字總是深入我的腦海中。當時臺灣的股票市場正是活絡的時候，如果我賣得的錢不馬上匯出去給廠商，而是拿到股市中轉一轉，馬上可以賺進大把鈔票，但是這樣做會失去信用，而且這些錢不是我的，如果投資失利，該怎麼辦？那一個人不貪？我只是個凡人，也會有貪念，我只是時時記著，信用第一，所以我雖然有很多機會，但是我不貪。

風險管理

我父親適逢新臺幣改革而遭殃，不幸引發中風，令我很難過，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，日後我時常思考和研究，如何防止類似的通貨膨脹災難降臨在我身上。我在圖書館找資料研究通貨膨脹如何發生？原來是政府印了太多鈔票。本來美金和黃金掛鉤，每一張美金鈔票後面都有一行字，註明這張紙鈔等同於多少黃金，後來美國把這行字取消了，美金與黃金脫鉤（1971年8月美國政府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），而且又一直在印鈔票，使我無法完全信任紙鈔。

我認為只有兩樣東西可以對抗通貨膨脹，那就是土地和黃金。買土地有缺點，土地要整筆買，不能說我只有一點點錢，只買一坪就好，沒有人會賣你一坪土地；其次，土地變現不易，出售時人家還會嫌地形不夠方正，挑三揀四，麻煩的事很多。黃金變現就容易多了。這30年來我研究的心得是紙幣，包括美金，都不可靠，只剩下黃金最保險。

一般人時常會思考一個問題，什麼時候買賣黃金？什麼價位時出手？我經過一番研究，始終找不到答案。黃金和股票不同，股票還可以算得出股息，黃金的缺點是沒有股息。最後我採取的辦法是，每年年終結算，如果當年度沒賺錢就不買，有賺錢時，則以盈餘的一成來買黃金，剩下的9成再滾到事業裏，增加資本額。30年前剛開始時沒信心，只拿出盈餘的一成買黃金，後來信

心愈來愈強，逐年增加到2成、3成，到今年是5成。

我買的黃金多是現貨，為什麼買現貨？因為隨時可以變現，有急用時不需要向銀行借錢。20幾年前，傳言共產黨要攻打臺灣，萬一真的打來了怎麼辦？黃金全部放在臺灣也不安全。如果要逃難，第一站不是香港就是日本，而香港是自由市場，所以我又到香港買黃金，然後在當地租銀行的保險箱存放，第一年沒事、第二年也沒事，到了第三年，我從香港回來的一個月後，接到銀行的人打來的電話，問我保險箱裏存放什麼東西？我一聽之下，不免光火，那一條法律規定我必需告訴你？他安撫我不要生氣，要我到香港看一看。我到香港一看，才知道因為長條深型的保險箱被黃金壓得變型，相鄰四周圍的保險箱因此打不開，銀行替我換了個最底層的位子才解決這個問題。

在動亂的時候，只有黃金可以保值，鑽石也沒什麼用，買的時候花一百萬，等到要賣的時候會被百般挑剔，也許只能賣五十萬。所以我從2010年開始，建議我的朋友，如果有閒錢應該買黃金，但不能像我以前一樣，到了年底才買，因為漲幅高，年初和年底的價差很大。

有朋友告訴我，金子很重，時局亂的時候，身上也揹不了多少。這是真的，我試過，100兩而已哦，我從一樓拿到三樓就拿不動了。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，過去打仗，有可能要逃難，但現在臺灣四面都是海，往

那裏逃？還需要逃難嗎？難不成跳到太平洋？其次，現在的金融環境和以前不同，臺灣有許多外國銀行，萬一有事，把黃金變成現款，30分鐘後就可以滙到任何指定的國家，飛機票一買，馬上飛到美國或其他國家去了，那裏還需要逃難？

我買黃金的態度，不是為了賺錢，而是從長遠的眼光著想，而且我只是用一小部分的存款來買，我心想，最好永遠都不要遇到需要動用黃金的時候，將來可以留給子孫。我以前算過，一條5兩的黃金條塊，夠我們夫妻倆兩個月的生活費，現在則可以支撐6個月，我有了這些黃金，就很安心，將來不需要依靠兒女，不管時局如何變化，生活都不至於發生問題。所以我買黃金，只是處理財務的一種方式，而不是貪念，想要賺更多，今天買黃金賺了錢，明天再借錢去投資，看看能不能多得到一些，那不是我的出發點。

人要有經受失敗的思想準備，我每回做投資之前，都會思考，萬一投資失敗，是否承受得起？即使失敗了也不會影響生活，才決定去做。最要緊的是我有黃金做後盾，就算碰到最糟糕的情況，賠光所有資本，至少還有黃金可以過活。感謝上帝，我到現在連一條黃金也沒用過。此外，聖經裏說貪財是萬惡之源，真是如此，人生很難算得準的。所以我做生意不借錢，也不得意忘形，不盲目擴充事業規模，就不怕經濟不景氣，付不出貸款。

我的處世格言

我自認為修養還不夠，所以在牆上貼了一些格言：「百戰百勝，不如一忍」、「萬言萬當，不如一默」，我對內和對外的處事原則就是一個「忍」和一個「默」字，家裏太太囉哩囉嗦，難免想要發脾氣，得要忍啊！我是基督徒，雖然很少閱讀聖經，但聖經裏的名言佳句和其他的格言，我都寫在紙片上，放在皮夾裏，5、60年來，我的皮夾裏，記著這些對我有幫助的話，時常提醒自己。

我從年輕時打拼，才有今天的局面，我常想如果我有力量，要盡量幫助別人，尤其是我周圍的好朋友、同學、校友和曾經對我好的人。我時常捐款做慈善，每年捐一部車子給慈善團體，做這種事只是一種對社會的回饋，心理感覺舒服些，把財產留給子女，他們不一定守得住。

【註釋】

1. 趙麗蓮（1896-1989）出生於美國紐約州；父親趙仕北，籍貫廣東新會，係留美法學博士；母親白薇熙（Bornstein）為德裔美籍醫學博士。1904年，趙麗蓮8歲，隨父母返回中國，就讀於上海美國學校；1919年，獲聘為北平女子高等師範學院音樂教師。1948年應邀到臺灣，先後在臺灣師範學院、臺灣大學外文系、文化學院、清華大學、交通大學任教。1949年5月，中國廣播公司邀請趙麗蓮講授「怎樣學習英語」，播出後反應良好，即請她主持「空中英語教室」節目；1950年，教育電臺成立，她在該電臺開闢「趙麗蓮英語時間」，專門教授英語；此外，還在華視開闢「鵝媽媽教室」節

- 目，教授少年兒童學習英語。
2. 葉翔之（1912-2001），化名陸重光、葉光華，生於浙江省餘杭縣，歷任軍統局少將處長、國防部情報局局長、中國國民黨第九、十屆中央委員，為情報界重要人物，蔣經國得力助手之一。
 3. 王新衡（1908-1987），生於浙江省慈溪縣。曾被選派至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，與蔣經國同學，返國後投身黨軍政界；抗戰期間任軍統局香港特別區少將區長、行政院上海市統一委員會秘書長等職；抗戰勝利後曾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長。1949年來臺，後轉入企業界，歷任亞洲水泥公司董事長、遠東紡織公司常務董事等職。
 4. 王永樹（1912-1989）字重三，浙江淳安人，來臺之後於1951年任總政治部第一組少將組長，歷任政工幹部學校校長（1952年）、憲兵副司令（1955年）、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（1959年）、第一軍團副司令（1961年）、陸軍特種作戰部指揮官（1964）、憲兵司令（1968）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副總司令（1972）、國家安全局局長（1974）。
 5. Julio César Turbay（1916-2005），哥倫比亞總統，任期1978-1982年。
 6. 洛克菲勒中心是一處由數棟建築組合而成的活動區域，涵蓋紐約第五大道至第七大道，介於47街至52街之間，區內含括餐廳、辦公大樓、服飾店、銀行、郵局和書店等，擁有許多複合式功能，各大樓底層相通，甚至還有地鐵貫穿連結，1987年被美國政府認定為國家歷史地標。1989年10月，三菱集團以2,200億日圓的天價買下了洛克菲勒中心，成為日本當年海外投資的經典案例。1995年5月日本公司宣布破產，14棟建築賣出12棟，只保留2棟。